

专供外销而生产的观点。甘淑美(荷兰莱顿大学)则对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克拉克瓷贸易进行讨论,认为克拉克瓷器盛产于1573年到17世纪上半叶,以海外需求为主要市场。

此外,亦有跨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瓷器外销及相关历史问题进行了探讨。如金国平(葡萄牙中国学院澳门研究中心)聚焦于一件收藏于贝雅唐纳·莱奥诺尔博物馆的1541年别球佛哩定制瓷器,对其图饰、产地及定制途径分别进行考证,认为其出现证明1521年—1540年这段文献数据记载甚少的时期,葡属印度与华南海岸之间有着非官方的商业贸易活动,是重塑双屿(Liampo)港时期中葡关系的重要实物。而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则从宏观的角度,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实物遗存相结合,探索了明代青花瓷器崛起成为主流的历史进程,认为青花瓷在明代普及于全国,而宣德、嘉靖和万历三朝是青花瓷发展的高潮时期,此时中国本土上层文化与世俗文化交融的完成,推动青花瓷形成中国瓷器主流。瓷器外销推动青花瓷走向世界,从而再催生出万里同风的中外文明会通的过程。

会议期间,各位专家学者共同参观了于澳门艺术博物馆举行的“澳门北湾出土外销瓷片展”,并前往澳门博物馆,参观澳门出土的部份外销瓷片,对诸多学术问题进行了不同规模的商讨,成果颇丰。本次国际研讨会的成功举行,进一步推动中国瓷器外销历史及中西海上交通、贸易史及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在促进中外学术界的沟通、交流与学术信息的共享等方面意义重大。同时我们亦体会到,16—17世纪中国陶瓷外销及相关历史课题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未来学者任重而道远。本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将在近期集结出版,以饕学界。

本文初稿,由“陶瓷下西洋”小组研究助理王冠宇记录整理,特此致谢。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郑培凯、范梦园)

2010年“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2月19—22日“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波举行,来自全国15个省、市和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的7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自2008年中国社科院与宁波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来,双方携手共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次研讨会为加强合作又书写了新的一页。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60余篇(含提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科举文献研究。本次会议着重研究天一阁藏科举录及其他科举文献。

鹤成久章在《天一阁明代登科录大型藏书之谜——兼论传入日本的〈明代登科录〉》中,不仅指出了天一阁所藏明代登科录具备系统性强、规模大的特点,还将日本现存中国明代的科举录情况进行了介绍。贺宇红的《天一阁馆藏文献与科举研究》则指出,除了天一阁所藏各种科举录外,馆藏文献中的地方志、谱牒等,亦是科举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王宏星《天一阁藏明天台卢氏科举考卷、圣旨、家乘考论》考察了天一阁博物馆收藏的明成化年间天台卢浚会试考卷、卢氏家乘及圣旨的重要价值。施祖青的《天一阁收藏明代科举文献的社会文化背景及个

人因素探究》对天一阁为何收藏明代科举文献这一问题,从社会文化背景及个人因素等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张波《科举文化发展中的服务与宣传——以天一阁博物馆为例》着重从现状、措施、预期成效等多个方面,论述了天一阁服务中心的近期工作与远景规划。谷敏《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的开发及利用情况概述》对天一阁藏科举文献的保存、流传、开发、利用及宣传服务工作进行了探讨。

另外,还有不少学者从文献价值、学术价值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明代至民国时期的科举文献。如钱茂伟的《明代进士登科录及相关问题研究》不仅指出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文献及史学价值,还就此领域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陈维新的《台北故宫藏清代科举文献》介绍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时期广西乡试舞弊案的科举档案,并通过对文献的解读,探讨了此弊案处理的经过。宋元强参与了国家博物馆《顾宪成试卷稿册》的出版工作,他的《顾宪成乡试卷的学术价值》对研究顾宪成乃至明代的东林党人都有参考作用。张杰《论朱卷在明代科举文献中的价值——以〈清代朱卷集成〉为例》探讨了清代朱卷对明代科举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文献价值。邓洪波《明代化育科举的良方〈二业合一训〉》对明代学者湛若水的《二业合一训》进行了细致分析。李占伦、乔丽娟的《民国稿本〈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述略》对这本有清一代最为详备的词选名录进行了考述。

二、科举学与科举史研究。刘海峰《再论科举文献与科举学》除进一步论述了科举文献的分类、特点、价值等外,还梳理和展望了科举学的文献研究发展前景。刘一彬《科举学的文献学视角》对“科举文献学”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相关理论体系。

李世愉《试论清代科场中的谎报年龄现象》对清代科场谎报年龄的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作历史的判断与评价。毛晓阳的《明代科举宾兴三题》探讨了科举中“宾兴”礼之现象,认为明至清代的“宾兴”基金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公益基金。贺晓燕的《“举人大挑”述略》从科举落第政策的角度来论述了举人大挑的推行及其影响。刘上琼的《清代学额治边政策述论——以广西为例》以清代广西科举考试的学额制度为中心,对清政府学额治边政策进行了论述。胡凡的《明代洪武永乐时期殿试政策之背景因素初探》认为,明代的殿试制策融经、史、时务于一体,称为“时务策”十分恰当。屈超立《三级科名制与明朝士人地位》认为,以进士、举人、秀才为整体的明代士人群体,较之前代士人,不仅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也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水盛凉《清末官员考试制度小论——以浙江〈甄别仕途新章〉为中心》探索了同治、光绪年间官吏考核制度的变化。许友根《科第人物的分科与系年——以〈唐代登科人名录拾遗〉为研究对象》就张忱石《唐代登科人名录拾遗》一文的具体问题进行辩证。沈登苗的《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对科举发展史上的相关重要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与分析。

在科举史上,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考试科目。刘晓峰的《入仕丹青——宋代科举与“画学”》就宋代科举特殊考试科目“画学”的产生、入学方式、取士方法等三个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邹长清的《清代翻译科研究》针对科举史上的学科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三、科举与各类专门史研究。王戎笙《是非功过议八股》梳理了八股文的发展过程,并给予客观的评价。何忠礼《南宋——八股文雏形的出现兼论以八股文取士的原因》对八股文产生的源头作了探讨。水上雅晴《乾嘉之学与八股文的关系初探》指出,清代乾嘉时期风靡一时

的考据学使得科举考试也随之受到影响。龚延明《清代科举与〈儒林外史〉》从清代科举制的角度,对著名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进行了新的解读。段江丽《通俗小说中的童生试、岁考与科考——以〈醒世姻缘传〉等为中心》从以描摹世态人情见长的世情小说中选取偏重写实的内容进行考察,以此为明代科举制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陈文新、郭皓政《明代状元别集问题分布情况考论》等论文,研究了科举制与八股文、通俗小说之间存在的互动。

韩国世宗大学李庆龙《阳明学在科举学上的效益和贡献》,张献忠《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以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为中心的考察》,从学术史的角度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考察。章宏伟《明代科举与出版业的关系——以汤宾尹为例》探讨了明末这个中国历史上经济发达、社会开放的时代,文人与商人之间如何有了更多的互动与接触。渡边健哉《从宋到明科举考试用书的发展》则从出版史、文献学史的角度考察了科举与书籍之间的关系。

祖慧《科举视角下的宋代皇帝》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宋代皇帝在科举改革中的作为,并进一步探究其目的及对社会的诸多影响。艾尔曼《明初政权、文化政策与科举考试》认为,明初帝王的许多政策是明代在科举考试中形成强大的“道学”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大野晃嗣《景泰天顺两朝的政权运营与科举——从景帝即位至英宗复辟》集中讨论了科举制对明代政治的影响。郭培贵《明代进士群体社会流动的再考察》考察了明代进士群体的出身构成状况,并据此分析了这个群体社会流动的特点和原因。郑若玲《〈清代朱卷集成〉的社会学研究价值——以社会流动的考察为例》以《清代朱卷集成》中功名获得者家世情况的统计结果来分析科举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进而探讨其社会学研究价值。费志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与近代尚武思潮的变迁》着眼于科举制度对重文轻武传统的强化,分析了科举制度附带产生的无兵文化危机。储建国《论中国宗族钱会对科举平民入仕的作用》指出,与中国地缘、血缘关系密切的宗族钱会,不仅推动了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还为科举平民入仕创造了条件。

四、地方科举、周边国家科举状况研究。杨齐福《科举考试与清代台湾社会》考察了台湾科举考试中鲜明的地域特色。李兵、李占伦《清代两湖“南北分闱”再探》利用档案文书、文集和方志等文献,分析了两湖“南北分闱”的原因、过程以及新建湖南贡院的情况。郎菁的《陕西历代进士数量及地域分布统计》、刘虹《明代河北进士分布解读》通过大量详实的数据,对进士在地域上分布的态势作了探讨。饶国庆《慈城冯氏科举兴盛考》就从政、治学、经商三个方面探讨了宁波慈溪冯氏明清以来科举兴盛的原因。袁慧《达者兼济天下,穷者创业商海——昔日甬人的人生追求与奋斗道路选择》对宁波人尊教重商的务实性格作了论述。周慧惠《嘉庆间鄞县童生罢考事件考》以嘉庆间鄞县童生罢考事件为例,分析了清代中期童生罢考、闹考事件的原因。

阮友心《对于莫朝升龙时期(1529—1595)的科举制之探》指出,越南在莫朝升龙时期所实行的科举制度,不仅选拔了大量儒学人士进入官僚系统,而且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维锦《了解越南从十一世纪至二十世纪半初期的儒学教育情况》指出,古代越南实行科举长达九个多世纪,使得越南不仅建立了完备的科举选拔体系,而且也为越南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科举人物研究。陈长文《明代教官进士登科考论》探讨了明代举、贡出身的县学教谕、

州学学正以及府、州、县学的训导等教官,为了自己的仕途,再度参加科举考试,从而进士登科这一社会现象。三浦秀一《乡试考官林光与明代中期的副榜合格者》考察了明中期副榜合格者境遇的变化。黄明光《明代部分资料稀缺状元生卒年等辑考》对部分资料稀缺的状元生平进行了考察,是其《明代状元奇谈·明代状元谱》的补遗之作。

黄卉《汤显祖的科举之路与文风》从汤显祖的科举之路入手,分析了他科场的成败与其文风之间的关系。王伟《论公安三袁的科举观》澄清了学界一般所认为的公安三袁“厌弃科举”的态度,指出袁氏三兄弟对科举的态度具有矛盾性、含混性。张亚群、李力《杨慎在科举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论述了明代四川状元杨慎的地位与影响。张宏敏《论黄宗羲对科举制度的检讨——兼论黄宗羲的教育思想》梳理了黄宗羲对科举的批判精神,并论述其教育思想。吴惠巧《晚清台籍进士丘逢甲之研究》通过深入分析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诗人、教育家、政治人物等多重身份的丘逢甲的生平活动,对其影响及贡献进行了准确剖析。

本次会议不仅角度多元,而且研究领域宽泛,新的文献资料被大量采用,“科举文献学”的理论构建也进一步成熟。学者们的讨论也非常热烈,堪称是一次严谨规范,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盛会。会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宣布在天一阁设立研究基地并现场举行了授牌仪式。该委员会拥有一支顶级的专家学者队伍,这是首次设立研究基地,既是对天一阁在科举文献保存、整理、出版方面所做成绩的肯定,也为科举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饶国庆、谷敏)

南海击波 丝路论剑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始于汉代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是南海区域各国间友好交往的纽带,在中外关系史上有重要地位。但是与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相比,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2011年4月25—26日,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和海南省海洋文化学会共同主办,海南师范大学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2011年南海文化学术论坛: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来自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3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7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代表们围绕“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这一主题,踊跃发言,深入论证,使本次会议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讨论主题突出。大会共收到与会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40余篇,其中20多篇是围绕“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这个主题的。张一平《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影响》系统论述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及其在整个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与重要性。阎根齐《论南海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深入分析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形成过程中的主要特征,指出“海南岛是古代中国人向南海航行探索的首站”。张朔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变迁及其对海南影响》根据海流